

中國音韻學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南京研讨会论文集·2006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國音韻學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南京研讨会论文集·2006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音韵学: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南京研讨会论文集:2006 /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3

ISBN 978-7-305-05350-4

I. 中… II. 中… III. 汉语—音韵学—学术会议—文集
IV. H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3602 号

-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 健
- 书 名 中国音韵学——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南京研讨会论文集·2006
编 者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
责任编辑 顾 涛 荣卫红 编辑热线 025-83592148
- 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17.125 字数 425 千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ISBN 978-7-305-05350-4
定 价 34.00 元
-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历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名称不一。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本届常务理事会决定，自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九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2006年）起，定名为《中国音韵学》，以此为定式。

2007年6月

目 录

- 团结一致,坚定地走自主创新之路——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九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 /鲁国尧 1
- 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方向——从发展中国戏曲谈起 /潘文国 5
- 汉语史研究中材料的考证与运用——答《字书派与材料派——汉语语音史观之一》 /孙玉文 15
- 怎样用现代方言去证明《中原音韵》的语言基础?——从多向的音系比较看近代北京话的来源及递嬗延续(一) /耿振生 31
- 来母谐声现象研究 /刘忠华 43
- 从楚简中所反映的一处语流音变看上古音拟测的几个问题 /赵彤 54
- 从战国文字的谐声看战国语言的声类 /陈鸿 59
- 上古楚方言冬部论略 /杨建忠 80
- 论两汉阴阳入三声对转关系 /刘冠才 89
- 《说文解字注》特殊注音浅探 /宋亚云 110
- 论姚文田的通转说 /陈芳 125
- 黄侃上古韵部研究的再思考 /乔永 137
- 《同源字典》中同源字的韵部和声纽关系 /魏清源 刘风华 149

- 中古口语音系中的次浊紧喉声母 /平山久雄 157
- 见系开口二等向“尖团合流”演化的进程 /万献初 170
- 见精组声母合流应已见于明清以前的方言口语 /黎新第 193
- 止开三知庄章组字在近代汉语的两种演变类型 /桑宇红 208
- 论三等韵里的庄组字 /刘华江 217
- 《经典释文》齿音声类异读初探 /沈建民 230
- 由广州话及《韵镜》建构《切韵》韵母元音长短配对说
/余迺永 241
- 《切韵》咸、蟹二摄一二等重韵中覃哈韵系构拟的一处商榷——
论前、央、后/a/不能同居于一个音系 /冯蒸 261
- 唐末以前音义文献中的“轻重”及其涵义 /储泰松 269
- 等韵学与音位学 /施向东 285
- 黑水城等韵抄本《解释歌义》新探 /严至诚 302
- 岑参、孟浩然诗韵研究 /陈大为 319
- 金源人声诗词用韵初探 /耿志坚 332
- 元代《礼部韵略》发覆——兼释至正年间屡刊《增修互注礼部
韵略》的原因 /李子君 339
- 《音韵正讹》韵母系统的特点 /高永安 357
- 艾儒略《职方外纪》中所透露的明末音韵信息 /刘静 369
- 读《拙庵韵悟》札记 /周赛华 380
- 《韵府群玉》的音切特点 /杨雪丽 390
- 《木氏宦谱》纳汉对音中的明代丽江汉语方音 /喻遂生 403
- 《音韵正讹》与明末宣城方音 /王恩保 414
- 《吾妻镜补·国语解》对音汉字所反映的清代吴语语音
/丁锋 426

- 从山东方言看元代儿化音的性质 /宋洪民 442
北京话 r 声母的变体及音位的聚合程度 /冉启斌 石锋 450
晋方言古宕江摄与曾梗通摄同韵史 /乔全生 465
粤语中古全浊塞音、塞擦音今读不送气清音之探讨 /林亦 470
江西万载方言的音韵特点 /孙宜志 487

- “吐蕃”的读音问题 /杨军 497
“身毒”的“身”字今音考 /范新千 503
例外音变和语音系统的调整——也谈“吞、寻”两字的例外读音 /薛志霞 507
杜甫对七言绝句格律建设的贡献——兼与王昌龄七言绝句格律之比较 /陆梅珍 519

编后记 / 535

团结一致，坚定地走自主创新之路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学术讨论会
暨汉语音韵学第九届国际学术研讨会
开幕辞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长 鲁国尧

诸位会员、诸位来宾：

今天，2006年8月24日，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九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古都南京隆重开幕。我们衷心感谢在座的170多位专家！诸位从世界各地不远千里、万里光临，使大会生辉。这届会议由南京大学和徐州师范大学联合举办，江苏的音韵学人，为报答海内外的专家，特假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山陵国宾馆举办本届会议。

公元208年，诸葛亮和孙权论金陵形势说：“钟山龙蟠，石城虎踞。”诸位同道现在就身处被诸葛亮比喻为“蟠龙”的钟山之麓。南京与音韵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顾炎武《音学五书》之首的《音论》论述“双反语”的一节，引用了孙吴时的童谣，其中的“石子冈”这个地名历两千年而仍存，如今在南京城西南。至于“同泰寺”、“大通门”当在今玄武湖畔的鸡鸣寺附近。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揭示了超音段音位声调的存在，并对其本体和应用作了相应的研究，影响极其深远，这件世界语言学史的大事就发生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南京，沈约、谢朓、王融、周顒等人在建康城发现了“四声”。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音韵学家、《切韵》纲纪的决定者之一颜之推（531～590？），他的“梓里”颜家巷就在南京今长干桥之南。“南染吴越，北杂夷

虏”，颜之推明确地揭示了南北朝时期汉语与阿尔泰语系、藏缅语族密切接触、汉语通语与吴方言交互影响的事实，在整个语言学史上这也应该是惊人的成就。南京话在汉语历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南北朝时期的建康话和明代、清代前期的南京话都可能是当时通语的基础方言。如果说“南京是音韵学之乡”，当之而无愧色，因此在南京举办音韵学学术研讨会，正得其所。诸位来自海内外的专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时此刻，济济一堂，可以说，规模远逾一千多年前在建康发现四声的学术群体，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先贤的辉煌成就，启迪、激励我辈后人。在中国近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环境下，中国的音韵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长期以来，团结和谐，共谋发展，一直是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的主旋律，无论何人，都不可能使我们音韵学人偏离、改变这一正确方向！为建设创新型的中国语言学而奋斗，这是我们语言学者的崇高原则，以往如此，现在如此，今后更应如此，这是任何人所动摇不了的！

若要了解自2004年8月中国音韵研究会汕头研讨会以来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这两年来发表的音韵学论文约在450篇左右，涵盖了音韵学的各个分支，涉及诸相邻学科，这贵重的繁荣景象应该归功于中外广大音韵学人的努力。

我们既要回顾以前的传统与成就，更要谋划壮丽辉煌的未来，这就是“继往”与“开来”的问题。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开来，如何开来？中国经典《易·系辞上》：“日新之谓盛德。”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诗人罗伯特·布朗宁（1812~1889）说：“进步是人类唯一的区别性特征。”19世纪西方著名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说：“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源于创新。”中外先哲的这些名言引起我们的共鸣，我们音韵学人都在各自的领域从事创造性的劳动。

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才是学术进步的动力；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才能为人类的学术做出贡献。我们应该特别重视自主创新，据我的“学”与“思”，我们至今没有一本

《中国语言学思想史》或《汉语音韵学思想史》，这委实是一件遗憾的事，何以至此？值得深思。试看其他学科，有关“哲学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心理学思想史”、“人口思想史”的专著俯拾皆是，甚至有“货币思想史”、“收入分配思想史”、“数学思想史”、“地理学思想史”这样的著作，然而就是没有“语言学思想史”！我们语言学人应该开展思想史的研究，写出质高量多的论著。我深信，一旦《汉语音韵学思想史》或者《中国语言学思想史》出版，它的著者必能在国际语言学坛上处于领先地位。

我还希望在几年之后有《汉语通语史》问世，很多语言都有通语，但是汉语通语及其历史的研究价值特高，汉语通语至少有两千多年的绵亘不绝的悠久历史，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对国家的统一，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是由于诸多原因，音韵学人的投入太少，以致历代通语的状况，我们至今不甚了了。研究得比较多的是明清官话，但是歧见颇多，比如其基础方言是南京话，或北京话，甚或其他？仍在热烈争论中。在此，我们向学术界呼吁，加强通语史的研究！我深信，一部《汉语通语史》将是对整个语言史、语言学史的重要贡献。

我们应该发扬先贤、先辈的创造性精神，勇于探索自主创新的途径，前人没有做过的，时人没有做过的，我们要做，而且要做得出众，做得卓越，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职责，我们要发出时代的最强音！

我们大力提倡自主创新！只有自主创新，才能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2008年是音韵学的经典《广韵》颁行一千年，我们有幸生逢其时，两岸四地的学者将举行学术讨论会庆祝《广韵》一千年，我们热烈欢迎国外的专家共襄盛举。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五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十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2008年8月下旬在《广韵》主编的故乡举行，恭请诸位光临。

正今朝，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分别黍累；两载后，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剖析毫厘。

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方向

——从发展中国戏曲谈起

潘文国*

假设有人提出一个问题,怎么发展中国的戏曲事业?回答可能会多种多样,但可能没有人会回答,必须“持续不断”地“引进、介绍”西方歌剧理论,以此作为发展中国戏曲的“动力”。尽管在汉外翻译时,中国的戏曲几乎毫无例外地被翻译成西洋的“歌剧”(opera):京剧是 Peking Opera,越剧是 Shaoxing Opera,川剧是 Sichuan Opera,大家都是“Opera”,那关于 Opera 的理论当然应该具有“普世性”。之所以不会这样回答,是因为人们都明白,两者的体系完全不一样,西方歌剧是男高音、女低音、男中音等,而中国的戏曲,不管哪个剧种,讲的都是生旦净末丑。这就使我想到,为什么一提到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人们就众口一词,认为唯一的出路是不断地介绍、引进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即“跟国际接轨”呢?好像非此中国的语言学就不能生存,就没有资格进入 21 世纪似的。

有人说那是因为西方的语言学“科学”、“先进”,比如音韵研究,中国传统的学者研究来研究去,只能区分出多多少少类,却不知道应该怎么读出这些不同类的音,以至段玉裁直至老死还以不能读出“支脂之”的区别为憾事。依靠西方的语音学和标音工具,我们却不仅能构拟出这些不同类的读音,还能构拟出远古时代的读音,一一加以细致区别,就

* 潘文国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好像调查邻近方言、进行记音似的。但我们要想到，西方的歌剧同样也很“科学”：女高音是多少赫兹到多少赫兹，男低音是多少赫兹到多少赫兹……不仅可以“量化”，还可以把“声乐”与“器乐”放在一起，进行科学的类比：什么声部相当于小提琴，什么声部相当于大提琴，等等，还可以用电脑进行合成，模仿出这些声音来。回看中国戏曲，有谁能说出“生”或“旦”的音高是多少吗？有谁能制定出一个“生”或“旦”的音域标准吗？“五四”前也有一些人痛诋“旧剧”，斥为“脸谱大全”，但好像还没有什么戏曲界的人用西洋歌剧作标准去改造中国戏曲，否则的话中国戏曲就只有死路一条。为什么到了语言研究，中国语言学就必须采用西方的理论，否则就没有生路呢？

有人说那是因为语言学具有“普世性”，叫“普通语言学”，因而适用于人类所有语言；而西方歌剧还不具有普世性，还没有“普通歌剧学”。我们认为，“普世性”云云，看你怎么理解。在“欧洲中心论”的人看来，欧洲（现在可叫做“欧美”）就是世界的中心，甚至就是世界全部。我们只要看看几百年以来出版的西方人写的世界通史、世界音乐史、世界文学史，世界艺术史，乃至世界语言学史等，就知道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在他们眼里占什么地位了。20世纪的普通语言学，至少在其创始人索绪尔那里，是并不包括汉语在内的，甚至也不包括斯拉夫语和阿拉伯语，也许只能叫做“西欧语言学”。认为在西欧语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一“普通语言学”，也适用于汉语，这是中国学者的自作多情。西方的歌剧理论，在西方人看来，未必不具有“普世性”，只是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的戏曲工作者特别是戏曲理论家认为这一“普世性”足以用来改造中国的戏曲。他们承认歌剧的所谓普世性，也就是到西洋歌剧自身为止。例如他们如果排演西方歌剧，就会严格遵奉西洋歌剧的规范，把演员分成男高音、女高音等，即使他们演唱时用的是中文。

从这件事里我们受到几点启发。

第一，不同的体系无法相容。

西洋的歌剧之所以不能影响中国的戏曲，是因为认识到它们采用的是两套体系，无法相容。西洋歌剧的演员是以物理学上的音高分类的，soprano、mezzo-soprano、contralto、tenor、baritone、bass 等都有固定的音高区域，能演唱到某一高度如 soprano 的，不管是男是女，都叫 soprano，中文译成“女高音”，是因为一般只有女性才能唱到这样的高音，其实西方古代有不少男孩子能唱 soprano，在十六世纪末歌剧于意大利诞生时，由于同中国古代一样，女子不能登台演戏，现在所谓的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都是由男人演唱的。但尽管这样，以物理学音高为标准却是一样的。这就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不但 soprano、alto（男高音或女低音）等与人的性别无关，甚至与是不是人也无关，乐器如小提琴、单簧管、低音提琴发出的声音也可以叫做 soprano、bass 等；二是这种声乐的研究很容易自然科学化，可以设立非常严格的标准。而中国戏曲中演员是以舞台扮演的角色来分类的，如生、旦、净、末、丑，其进一步的分类更是以舞台人物的性格为依据，如老生、正生、小生、须生，老旦、正旦、小旦、彩旦、悲情旦、刀马旦等等，再细分就要以演员的风格为标准了，如杨派老生、马派老生、梅派青衣、程派青衣。而这些分工又不是截然的，不时可以来一个“反串”，唱生的演旦角，甚至唱旦的反串老生，都未尝不可，不像西洋歌剧演员好像没听说高音可以改唱低音什么的。在欧风东渐及近些年来的商品经济大潮中，中国的戏曲受到冲击，无可奈何地在走向没落，有识之士在呼唤重新振兴昆曲、京剧等等，但好像没有人会主张用西洋歌剧的那一套来改造中国戏曲的，尽管这一分类“科学”（相应也“呆板”）得多。其实人们很少想过，语言研究也一样。西方的语言研究传统与汉语的语言研究传统，属于两套很不相同的体系。西方是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中国是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有人以为这两种体系本质上差不多，我们对此不敢苟同。诚然，两种体系的出发点都是各自语言基本单位的“一体三相”，但

由于基本单位的“体”不同，“三相”的表现和重点也不同。西方语言(以英语为例)的基本本体是“词”(word)，三相是词音、词义、词形，其中词形主要表现为形态，在三相基础上分别发展出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而以语法学为重点。汉语的基本本体是“字”，三相是字音、字义、字形，其中字形主要表现为形体，在三相基础上分别发展出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而以文字学为重点。说中西语言研究分别以语法和文字为重点，从名称上也看得出来。西洋的语言学，分则称 phonetics(语音)、vocabulary(词汇)、grammar(语法)，合则称 linguistics(语言学)，但 linguistics 也可称 grammar(如传统语言学也叫做传统语法、生成语言学也叫做生成语法)，可见语法的分量之重。汉语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合称为“小学”，但小学也可称文字学(“广义”的文字学)，如钱玄同著有《文字学音篇》，“音”者，音韵学也，这里居“文字学”的下位，可见文字的分量之重。这两套体系同样很难相容。硬要用西方的语言学来改造中国的小学，就好像坚持用西方的歌剧来改造中国的戏曲一样，其结果只能把后者拆得支离破碎，面目俱非。我们不妨看看一百年来用西洋语言学改造汉语语言学的结果：首先是因为在西方的研究体系里文字没有地位(在西方语言里，文字只是“符号的符号”)，因而在传统小学里作为基础的文字研究被“现代语言学”理所当然地逐出了语言研究的殿堂，随着一波波声讨汉字热浪的高涨，汉语和汉语研究被抽掉了脊梁骨；其次，在传统研究中一向着墨较少的语法学因其在西方语言学中居核心地位，因而也同样“理所当然”地一变而为汉语研究的绝对中心。这一基础的变化造成了汉语研究全局的变化，在 20 世纪以来的汉语研究里，文字学被排除出去了；音韵学被朝向历史语音学方向进行了改造(用一些学者的话来说，是从“考古”走向“审音”或“构拟”)，实质上已同传统汉语音韵学很少共同之处；训诂学则被拆得七零八落，变成了词汇学、语义学、语法学、修辞学、篇章学、语用学等等的大杂烩，而且由于政治上一再的厚今薄古、是今非古，而变得日渐“边缘

化”。中国的语言学传统——小学已不复存在，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属于昔日的辉煌，供怀有思古之幽情的人去凭吊。我们这里不想对这一改变的是非做出评论，只想指出这一事实。其实这一改造在许多领域都在发生，如西医对中医的改造、西洋画对中国画的改造、西洋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改造，乃至西式教育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改造，等等。但好像没有像语言学那样彻底而且义无反顾的。回到本文开头，我们庆幸的是中国的戏曲还好没有按照西洋的歌剧去改造，因而尽管现在步履维艰，却为世界留下了一块发展多元文化的沃土。到了21世纪，其中有的品种如昆曲还否极泰来，成了联合国宣布要保护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 第二，一种理论是否具有“普世性”，关键不在于提出者，而在于接受者。

热衷于引进西方语言学的人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诫我们说，西方语言学理论具有普世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问题在于，“普世性”是从哪里来的？所谓“普世性”(universality)，本质上是“普适性”(universal adaptability)，即普遍适用性。对于某种理论或体系的提出者，几乎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理论或主张具有普适性；只是有人谨慎一点，不敢直接表露出来，有人大胆一点，一开始就大张声势地宣传自己的东西如何如何具有普世意义。同时，普世性与普遍性(popularity)和优势性(priority)也有关系，人们对多数人认可的、习以为常的东西(语言学中管这些叫“常识”)往往认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而认为与自己不同的，就是独特的、怪异的、甚至错误的东西。《阿Q正传》里的阿Q，也是一切以未庄之是是为是，以未庄之非为非：“譬如用三尺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①因此，一种理论或一件

① 见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491页。

事物是否具有普世性，并不是由提出者决定的，关键在于接受者。在以天朝大国、礼仪之邦自居的古老中国，一切以中国之是是为是，以中国之非为非，因此头发披下来，衣襟向左掩，所谓“披发左衽”^①，就是野蛮人的标志，但这并没有征求过当时四周少数民族的意见，也没有征求过当今时髦女郎们的意见。同样，15世纪以来，欧洲发展迅速，在文明程度以及各个领域，都领先于世界，更不要说科学技术方面。欧洲人在骄傲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欧洲中心论”。所谓“欧洲中心论”，就是一切以欧美为标准，以欧美之是是为是，以欧美之非为非。对于欧美中心论的产生，我们完全可以抱着同情的理解，但我们是否需要跟着鼓吹这种欧美中心论，亦步亦趋地以欧美之是是为是，以欧美之非为非，却取决于我们自己。在这方面，中国戏曲的发展同样给我们以启示，他们没有以西方歌剧作为人类歌剧的唯一标准，因而避免了在追求普遍性的同时丧失自己的尴尬，取得了独立发展的余地。在语言学上，从17世纪的普遍唯理语法，到20世纪的转换生成语言学，欧美人也一再提出所谓的普遍语法，对此我们无可厚非，也可以理解。但是否需要全盘接受，却要经过我们自己的思考。有人愿意无条件加以接受，当然是他们的自由。但也要允许其他人从自己的语言和语言研究传统出发作独立的思考。“五四”初期陈独秀那种“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②的态度，在今天是不会有市场的。

第三，对待理论学说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态度。

那么，如何对待西方理论学说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呢？是否一概排斥、拒绝“引进”呢？那当然也不是。从中国戏曲和西方歌剧的关系看，我们得到的一点启发是，首先必须保持彼此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关系。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是从

① 《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② 见陈独秀《答胡适之》，《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1日。